



1

我无法再直视那双眼睛,如果再多看一眼,就会在众目睽睽之下失控流泪。为了不让自己失态,我冲出长征纪念馆的党课教室,奔向于都河畔,想用贡江的清水、碧蓝的天空,让我忘记眼前的那双眼睛。可是,那双眼睛依然一直在我眼前眨动,双眼泛着血泪。我极力想让自己忘记那双眼睛,却怎么也做不到。那是一双哭干了泪水的眼,久盼不见征人归,倚门眺望,望穿秋水。

实是不忍回眸,甚至不敢转身再朝纪念馆的方向看一眼。我向西而去,走到二百米开外的于都渡口。望着那条大江,当年的小船划过的惊涛,都散去了吗?多只木船连在一起搭成的浮桥,托起了一条长征路。九十年来,惊涛骇浪,洪波急流,都化作了眼前这一片决决贡江水,此刻我的心难以平静。

1934年10月,秋色映着于都河,田里的稻子要收割了,红军们要走了。老百姓把家里能找到的木板全都拿出来,在于都河上架起了浮桥。长征就从这里开始。

王金长出发时,赶制小船的民工和送别的乡亲都来到渡口。父母送儿子,妻子送丈夫,女儿送父亲……客家人把自己的命,押在了长征路上。

看着和自己一起长大的金长哥哥登船,段桂秀一双明眸染泪,红了眼眶。“等我回来——”哥哥语气坚定。她深情地看着哥哥,说:“我等你。”她只能送他到这里了。她不知道,这一等就是近二十年。

段桂秀生于1918年,十个月大时就进了王金长家做童养媳。那时,王金长七岁。二人慢慢长大,到了段桂秀十四岁那年,王家张灯结彩,挂起了大红灯笼。月上柳梢头,王金长掀起了新娘的盖头。婚后未出蜜月,丈夫就去参军了。而后渡口一别,竟成了两人的永别。

每年到了王金长出征的日子,段桂秀都要来到渡口,望向丈夫离开的方向,泪如雨下。一年,两年,十几年过去了,她不知流了多少相思泪,临行前丈夫的话,一直是她心中的念想。

她安心在家伺候公婆,拉扯小叔成人。

2

于都,历史上称雩都,因老百姓不识此字,新中国成立后改为“于都”。于都河是赣江的东源,是贡江在于都段的别称。

过了这条河,约三十六公里外的祁禄山,有一条长征小道。那里原本是人迹罕至的山林,路边溪水潺潺,满是山竹老树。小路边有一处宣传牌,标注着:于都县·登贤段。

1934年10月中旬,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随中央第一野战纵队,星夜渡过于都河。南下突破敌人第一道封锁线之前,在这里秘密行军的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等直属机关及红三、五、八军团部分部队,共计三万多人,踏着于都县通往安远、信丰古驿道的这段山路行军,这里从此留下一条红军长征小道。

当年,这里树冠遮天,夜深露重,长路漫漫,怕被敌人发现,几公里才燃起两三个火把。火把如同烽火台上的狼烟,辨不清哪是雾气,哪是烟。

一棵青松,一具忠骨。当年家乡祁禄山的后山上,每一个上前线的人,临行前都种下了一棵树,相约胜利后来这里相聚。然而,他们再没有回来,只剩下十七棵树日日守望,夜夜相伴。

3

新中国成立后,当年出去的,该回来的都回来了,可段桂秀始终没有见到丈夫王金长。“知不知道他在哪里?”段桂秀逢人便问,可丈夫音讯全无。

1953年,她等来了一纸烈士证明,村干部告诉她,1935年,王金长在战场上牺牲了。段桂秀苦等了那么多年,等来的却是一张纸。她捧着那张纸,反复地摩挲,不知哭了多久,最后眼泪哭干了,心血上涌,血泪一点一点从眼里流了出来。

她不相信,丈夫说过让她等他回来,他是不会撒谎的。但从那一刻起,她知道丈夫再也不会回来了。就在她101岁、丈夫离开她85年时,她走进了于

都烈士陵园,找到了王金长的名字。近百年的深情,在她心里熬了太久,最后终于见到了丈夫的魂之归处。

2021年,103岁的段桂秀在亲人的陪伴下,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站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下。她凝视着从金水桥上走过的国旗护卫队,凝视着在晨曦中升起的国旗,凝视着人民英雄纪念碑。那是一座人民的丰碑,是民族精神的象征。纪念那些无名的人,那些埋骨青山的人,那些为民族的解放事业牺牲的人。

4

二十年前,我采访过曾任河南省卫生厅的第一任厅长,时年九十一岁的王太钧。他从赣州出发,十四岁便跟随红军千里跋涉。因为年龄太小,组织没有将他

血色双眸



徐 剑

分到战斗部队,而是让他留在红军后方总医院做了看护员,照顾受伤的红军战士。

王太钧的大哥王太锡少年时学得一身好武艺,时常在村子里行侠仗义。1929年,大哥参加了红军,出发时,很多人都见过他。但后来就再也没有大哥的消息了,谁也说不清他究竟是在渡湘江时,还是在突破封锁线时牺牲的。红军过赣南、粤北一带,广东军阀陈济棠无意参战,与红军秘密达成停战协议,让出一条通道。

王太钧随着部队进入班佑草地,那茫茫草原,没有人烟,没有树木,甚至没有鸟鸣,时而黑雾如幕,时而风雨交加,时而骄阳似火,时而白雪漫天。时任红三军团第十一团政委的王平在他的回忆录里,记述了这段历史:“红十一团过了班佑河,走出七十多里,彭德怀军长对我说,班佑河那边还有几百人没有过来,命令我带一个营返回去接他们过河……走到河滩上,我用望远镜向河对岸观察,那边河滩上坐着至少七八百人。我先带通讯员和侦察员涉水过去看看情况。一看,哎呀!他们都静静地背靠背坐着,一动不动,我逐个查看,全都没气了。我默默地看着这悲壮的场面,泪水夺眶而出。”

班佑草地上,年轻的红军战士在风雪中化为一座座冰雕,铸就了精神的永恒。

王太钧的二哥王太生在新婚燕尔的第二年,也参加了红军,投身萧华的“少共国际师”,后来当上了特务连连长。在一次战斗中,他受了伤,子弹从左侧头部打进去,从鼻翼里面穿出来,伤势严重,无法再跟着部队前进,便回了老家,把自己的党证藏在了山洞里。新中国成立后,他从山洞中拿出党证,参加了农会,做了当地的贫协主席,当上了生产队大队长。

从农村走出去,又回到农村,守着那份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日子。在中国的大地上,有多少像王太生这样的人,为了新中国的诞生,他们不惜牺牲一切。革命胜利后,他们回到乡野,隐姓埋名,隐没于寻常百姓之中,继续过着简朴的生活。功成不受爵,长揖归田庐,是何等的大义。

三个兄弟中唯有王太钧走到了延安。新中国成立后,王太钧做了河南省卫生厅的第一任厅长。他依然深信大哥还活着,始终没有放弃寻找。直到2000年,王太钧的大女婿在广昌烈士陵园已建碑前,看到了王太锡的名字。

5

在于都,在瑞金,在兴国,有很多家庭也都是满门忠烈。我听过这样一个故事:红军“扩红”时,一位老首长把一个村子里的年轻人都带出去了,最后却一个都没能回来。陪同我采访的一位曾姓于都人,给我讲了本家奶奶的一段往事:

奶奶本名钟招子,是于都银坑镇窑前村人。因丈夫早逝,她独自拉扯十个孩子长大。1934年,红军“扩红”,她把八个儿子送去参军,留下两个幼子。出发前,她叮嘱孩子们:“一定要打胜仗,妈等你们回来。”

自从八个儿子参军后,钟招子就在自家门前点起了一盏马灯,每到天色低垂时,她就点亮马灯。马灯挂在

的战友换了一茬又一茬,有的人倒在阵地上,有的人失散在行军途中,有的人伤愈归队时胳膊已少了一条。而他活了下来,活着走到了1934年的秋天。

那一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红军不得不离开中央苏区,开始转移。

多年以后,爷爷对父亲说起那个夜晚时,只用了五个字:“什么都舍了。”

根据地舍了,那是用鲜血“浇灌”的土地;战友舍了好多,前四次反“围剿”活下来的老弟兄,第五次时倒下了大半;和家里的联系舍了,此后再也没有见过自己的父母。

他在出发前的那个黄昏,站在村口的山岗上,朝着家乡的方向望了很久,他是在告别,告别认识的山,认识的人,认识的家。

此去一别,不知何日能还。此去一别,许多人便真的再也没有回来。

1934年10月,一个秋夜,他随部队渡过于都河。浮桥晃晃悠悠,八万六千名红军将士的脚步踏上,发出沉闷的声响。没有人说话,队伍沉默得像一条黑色的河流,缓缓向西流淌。

长征路上都经历了什么,爷爷很少提起。那些事太重,重到他不愿让子孙背负;那些事也太痛,痛到他用沉默来包裹。

但有些事,沉默也藏不住,比如奇袭腊子口。

那是1935年9月,红军到达甘南南部的腊子口。这是进入甘南的最后一道天险,两侧是陡峭的石崖,中间一条窄窄的通道,敌军修筑了坚固的碉堡,硬攻不行,只能奇袭。

一支小分队趁着夜色,攀上了陡峭的崖壁。他们用手电抠着石缝,一寸寸往上爬。指甲磨掉了,手掌磨破了,鲜血染红了岩石。当他们出现在敌军碉堡上方时,敌人做梦也没有想到,有人能从这样的绝壁上爬上来。

碉堡被炸毁,通道打开了。

爷爷参与了这场战斗。他说,那一夜,没有月亮,只听到身边战友的喘息声,还有远处的狗叫声。谁也不敢往下看,只能一个劲儿往上爬。爬上屋顶之后,天边刚好露出第一道曙光。那一刻

门前,也挂在她心里,她多么希望孩子们能早日回家呀。

可直到新中国成立,依然没有孩子们的消息,她猜测,他们应该是回不来了。于是,就在村后竹篙岭的大树下,她和小儿子一起给哥哥们建了衣冠冢,并嘱咐晚辈,日后要去祭奠。孙子问她,为什么不立碑?她说,他们都没有回来,没有尸骨,衣冠冢怎么立碑呀!

于都长征纪念馆里,我看到了那盏夜夜为孩子们点亮的马灯。马灯的油燃尽了,就像钟招子干涸的眼睛,从此眼睛里流出的也不再是眼泪,而是心头的鲜血。

6

当年我在写《天晓1921》时,到过何叔衡的老家,推开何家老宅的大门,一窝春燕扑棱棱飞起来,朝天上冲去。

何叔衡的夫人袁少娥,1874年出生,比何叔衡大两岁。何叔衡走上革命道路后,夫人袁少娥独自持家,把两个女儿拉扯大。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疯狂屠杀革命者,通缉令贴到了何家祠堂,她被迫一次次隐居深山。何叔衡曾经写家书给袁少娥:“我的老妻,您如果活到六十岁,我或者与您有见面之日,但您的生,要是捡柴、栽菜、喂猪的生,不要去求人的生。我是永远要对得起我的骨肉和您的呀!”端午节是何叔衡的生日,每年的这一天,袁少娥都要依照当地习俗,在屋前插上艾叶,把不曾说出的思念与祝福,全都寄托在艾叶上。

始终不见丈夫回来,她便日盼,夜夜盼,盼着终有一天,丈夫会回到自己身边。

那天,我在何叔衡纪念馆徘徊了半日,临行前,看馆的何叔衡侄媳妇问我,要不要去看看何家老妇人袁少娥的坟冢。当然要去。路上,侄媳妇说,当年,老太太知道自己时日无多,把两个女儿叫到身边,问:“我和你们的爸爸生不能同日,死可以同穴吗?”

站在何叔衡故居前,我仿佛看到了袁少娥那双祈盼的眼睛,充满了渴望与无助,像段桂秀一样,哭干了眼泪,泛出鲜红。

长征开始前,何叔衡备好了两双鞋子,准备跟随红军转移。可是,在后来被称为“苏区五老”的几位老同志里,唯独何叔衡的名字没有出现在转移名单上。出发前夜,他邀来林伯渠,一瓶清酒,一碟花生米,一夜长谈。临近拂晓,他脱下身上的毛衣,交给林伯渠:“这件毛衣是我离开上海时,小女实山、实嗣姐妹织的,我穿了三年。你跟着主力部队走,山高路远,冬天就要来了,带上挡挡风寒吧。”此情此景,林伯渠以诗为记,将“赠我绵袍”的情景留了下来。

1935年,留守的中央分局决定让何叔衡等人转移,就在转移途中,年近六旬的何叔衡体力耗尽,面对围堵的敌人,他不愿意再拖累队伍,毅然跳崖。崖下,受重伤的何叔衡遭遇搜捕的敌人,身中两弹后牺牲。1964年,当地政府在他倒下的地方,立了一块碑:“何叔衡同志死难处”。

1957年,袁少娥追随何叔衡而去,她没有等来与夫君合葬。荆条与树从深处,水泥栏杆围起的墓冢,墓碑上刻了一行字:何叔衡烈士之夫人袁少娥墓。

7

段桂秀和袁少娥一样,没有见到丈夫归来,没有见到丈夫的尸骨。从接到烈士证书,到看到烈士英名墙,再到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段桂秀离丈夫越来越远,丈夫的去向也越来越清晰。在她快走不动的时候,她最后一次来到于都渡口,最后一次远眺,最后一次看这条河,直到最终自己也化为了了一抔尘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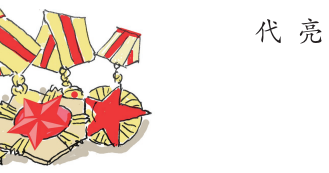
当我看到纪念馆屏幕上投影出的段桂秀时,忍不住泪奔。于都河六七百米宽的水面如镜,水色澄澈,没有一点波澜,像一面大镜子,照着昨天、今天和明天。河底仿佛浮现出那双满含血泪的眼睛,它们望向星空,望向雪山草地,望向漫漫长征路……

岸边忽然嘈杂起来,刚刚在纪念馆参观的人,也来到了江边。讲解员告诉我,今年的8月23日,段桂秀老人终于合上了双眼,终年108岁。

(作者系火箭军政治工作部文艺创作室原主任,中国作家协会第八、第九、第十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长)

红星照前路

——回忆我的爷爷戴文贤



代 亮

的光,是他见过最亮的光。

那一年,他二十一岁。

这些战斗,后来被写进了历史。可在爷爷的记忆里,历史是具体的,是铁索上的冰凉触感,是崖壁上的淋漓鲜血,是那些再也看不见天亮的战友,是那道一生中最亮的曙光。

长征路上,不只有激烈的战斗,还有似乎永远走不完的路,翻不完的千山。

夹金山,海拔四千多米,终年积雪。爷爷是江西人,当兵之前从没见过雪山。夹金山的雪,让他第一次知道什么叫冷。我曾重走爷爷的路,我实在难以想象,身穿单薄军装,草鞋的红军战士,是如何走过这座雪山的。

爷爷曾对父亲说过,过雪山的时候,谁也不许停。停下了,就永远留下了。有的战士因困睁不开眼,一边走一边睡,走着走着就歪倒在路边。活着的继续走,踩着倒下的战友的足迹,一步步向前。那时候没有多余的力气哀伤,悲伤是活下来之后的事。

然后是草地。

松潘草地,看上去是一片绿色,底下却是噬人的泥沼。走错一步,人就陷下去了,开始还挣扎,越挣扎陷得越快。战友们伸手去拉,往往连拉的人也被拖下去。后来有了经验,陷下去的人不能拉,只能趴在旁边的草甸上,递一根扁担过去,让他自己一点点爬上来。可是很多时候,根本没有扁担,也没有草甸,只能眼睁睁看着一个人在你面前消失。草地上有两个敌人,一个是沼泽,一个是饥饿。

男孩站在红军坟前的女卫生员铜像旁,看着英烈墙上的名字:龙思泉,男。男孩大为惊讶,喊道:“姥姥快来看,这个人明明是女的,墙上写错啦。”

明玉赶过来,只看了一眼,眼眶便湿了。她一手摸着孩子的头,一手擦眼泪,默念叨:“爹,找到了,终于替您找到了,您可以安息了。”

男孩更惊讶了。“姥姥,太姥爷总让咱找的红军坟,就是这个吗?可这铜像是女的啊,墙上怎么给写成男的了?”

明玉蹲下来,伸手摸着孩子的脸,说:“之前没人知道这位红军小卫生员的名字,他被敌人杀害时只有19岁,开始人们叫他‘小红军’,后来传着传着就叫做‘小红’了。再后来,遵义当地要为他建铜像,既然叫‘小红’,当然是女人了,所以就把他雕成了女人。再往后,才得知他是男,身份也最终被确定。龙思泉,他就是太姥爷让我找的人。”

陵园里庄严肃穆,天上的云洁白无瑕。1935年1月,红军长征到达遵义,龙思泉随红三军团五师十三团二营进驻遵义城南的桑木垭一带。那时,遵义正面临一场传染病“鸡窝寒”,也就是伤寒。方圆几十里的村寨九成都空了,百姓缺医少药,疾病缠身却无钱医治。

龙思泉除了担负全营的防病治病工作,还积极为驻地群众看病。不管白天黑夜,刮风下雨,只要有人找,他总是有求必应。

一天,一个中年农民从二十里外的松木岭赶来,跪在龙思泉面前,请求红军为他病重的父亲看病。经上级批准,龙思泉背上药箱翻山越岭,来到松木岭。

检查,患者得的是伤寒。龙思泉给患者打针服药,当晚住在患者家里。第二天一早,患者病情好转,龙思泉告别老乡,准备返回部队。可当他推开房门,发现不大的晒谷场上站满了人,大家听说红军的神医来了,都来找他看病。

龙思泉很为难,按规定他必须按时返回部队,部队更需要他,何况部队随时有开拔的可能。可是,他看着赶来的乡亲们,有抱着孩子的妇女,有拄着拐杖的老人,有高

对长征的了解,从一首诗开始

一句“乌蒙磅礴走泥丸”

在脑海里碾了半生

从那天起,我有了信仰

一颗红色的火种

在幼小的心底,悄然发芽

父亲说过

爷爷活着时,渴望和平

希望长大后,能成为红军战士

后来父亲真的上了战场

在枪林弹雨中穿行

九死一生,活着回来

信念更加坚定——

永远跟党走

岁月压弯了他的腰

那根脊梁,却依然像钢铁一

样挺立

烧不退的孩子。他心里一热,便决定再多留一天。

等他第三天返回驻地时,发现部队已经出发了。营长托房东刘大伯给龙思泉留了纸条,让他沿着部队出发的方向追赶。

刘大伯和乡亲们一起送别龙思泉,不想龙思泉刚走出不远,就传来三声枪响。原来龙思泉给乡亲们治病的消息被敌人得知,敌人派特务跟着龙思泉,伺机将其杀害。

当地没人知道他的名字,刘大伯带领乡亲们将他就地安葬,给这座坟起了个名字叫“红军坟”,把坟的主人叫做“小红军”。大家都知道,小红军年纪不大,还是个大男孩。

红军撤走后,国民党卷土重来,红军坟被毁。刘大伯悲愤难当,他号召村民说:“大家走过路过,一人添一捧土。红军坟,必须留下来!”没多久,一座新坟又被村民们重新修好。

60年后,坟的主人终于有了名字。

1953年,遵义市人民政府修建红军烈士陵园,将红军坟从桑木垭迁入园区,当时,没人知道坟的主人到底是谁,只知道是一个

很年轻的红军卫生员,群众都叫他“小红军”,传着传着就成了“小红”。

1990年,当地铸造了一尊铜像安放在墓前。因为一直被称为“小红”,铜像就被塑成了一个女卫生员怀抱婴儿,拿着汤匙喂药的形象。

后来,时任第三军医大学校长的老红军钟有煌,有一次带领学员来到遵义,听说了“红军坟”的故事,想起当年他在红三军团五师十三团任军医时,“遵义会议”后部队开始“四渡赤水”,二营有一名叫做龙思泉的卫生员,因外出给老百姓看病没能归队,一直下落不明。离休后,钟有煌反复论证,最终提出红军坟主人是龙思泉的观点。

1995年,中共遵义市委党史研究室根据钟有煌提供的材料,经调查核实,最终确认红军坟里长眠的,正是龙思泉烈士。

一个被叫了60年“小红”的男人,终于有了自己的名字。而那座铜像,至今依然是一个女卫生员的形象。

故事讲完了,男孩眼里噙满泪水。“姥姥,龙思泉叔叔好伟大,我觉得那位刘大伯也很伟大。”

“刘大伯就是你的太姥爷,我的爸爸呀。”明玉说。听到这话,男孩眼睛一亮:“姥姥,下周学校演讲比赛,我就讲红军坟的故事!”

本版题图 张宇尘

对长征的了解,从一首诗开始	二万五千里路
一句“乌蒙磅礴走泥丸”	是他们用血肉,一寸寸丈量
在脑海里碾了半生	是信仰的力量,让他们——
	踏碎湘江寒浪
	以命为舟
	铁索横江
	血色殷红
	融进了后来者的血脉
长征,走过的	是信念
是回望	如今回望
硝烟远去	脚印还在
铁索已凉	雪山安静
纪念碑上,每一个年轻的名字	都是光荣而永恒的刻度
仰望长空	仰望长空
一片湛蓝,辽阔	一片湛蓝,辽阔
我心底那颗藏了半生的火种	我心底那颗藏了半生的火种
从未熄灭	从未熄灭
风一吹,就燃起熊熊的火光	风一吹,就燃起熊熊的火光

我没有见过爷爷戴文贤。他在我出生前八年就离开了人世。

1985年5月,广州的凤凰花正开得如火如荼,他却在病床上安静地合上了眼睛,享年七十一岁。

关于爷爷的一切,我都是从父亲的口中,从那口旧箱子里泛黄的纸张上,以及爷爷的回忆录里一点一滴拼凑起来的。我拼得很慢,像拼一幅没有原图的拼图,有些碎片怎么也对不上,有些空白怎么也填不满。直到多年以后,当我沿着父亲口中那条“很长很长的路”一点点回溯,才隐约看清了他一生的轮廓。

那条路,叫长征。

我最早知道“长征”,是在小学课本上。爬雪山、过草地、吃树皮、煮皮带,那些印在纸上的文字,遥远得像另一个世界的故事。

直到有一年夏天,父亲从柜子深处拿出三枚勋章。“这是你爷爷的。”父亲说。

一枚红底黄边的八一勋章,金色镶边里嵌着红星,正中是闪光的“八一”二字;一枚独立自由勋章,底色金黄,中心是延安宝塔山,宝塔上由红星;还有一枚解放勋章。三枚勋章静静地躺在盒子里,金属的表面虽有些细微的划痕,但被擦拭得干干净净。

“这是你爷爷留下的。”父亲说。

那一刻,我第一次真正想知道,这个我从没见过面的老人,到底走过怎样一条路。

戴文贤,我的爷爷,最早的名字,叫“红小鬼”。

1929年,江西吉安袁家村的山村里,一个十五岁的少年扛起了梭镖,当上了乡里少年先锋队的分队长。那时的他大概还不知道什么叫革命,什么叫理想,只知道穷人要翻身,只知道跟着红军走,能有一条生路。

1930年,他正式加入了中国工农红军。十六岁的少年,在今天看来还是个孩子,却已经扛起了枪。父亲给我看过一份爷爷留下的履历表,纸张已经发黄发脆,但上面的字迹依然清晰,“红一军团战士、班长、排长、连长”。短短一行字,纪录了他从少年到青年的全部岁月。

苏区五次反“围剿”,他打了整整五次。身边

勋章,独立自由勋章,解放勋章上的五角红星,在我眼里依旧有着耀眼的光,那是九十年前的光。

九十年前,一个年轻的红军战士,正是头顶着这颗五角红星,从江西走到了陕北。他跨过了湍急的河流,翻过了险峻的高山,走过了荒凉的草地,脚上全是水泡和老茧,身上有七处伤疤,而他的战友,十之八九都倒在了路上。可他走到了终点。

他带着这颗星,继续走了下去。走过抗日的烽火,走过解放的硝烟,走进了一个崭新的中国。他从不觉得自己是英雄,只觉得自己是那个幸存者,替那些倒下的人活着。

九十年前的那条路,如今还在吗?

我曾在家里,一遍遍地看他的老照片。有一张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他穿着军装,站得笔直,胸前的勋章闪着光。他的脸上有风霜刻下的痕迹,眼睛却异常明亮。那种明亮,是我在许多老战士的脸上见过的——经历过最深黑暗的人,往往拥有最清澈的目光。

我知道,那条路还在。在每一个咬牙坚持的人脚下,在每一个不向命运低头的人心里。每代人有每代人的长征。我们不需要爬雪山、过草地,但我们同样需要穿越人生的迷茫与困顿,需要翻越属于自己的高山,需要走出一条自己的路。

而爷爷留给我的这颗星,是夜空中最亮的指引,它告诉我:往前走,别停下。哪怕铁索寒彻,哪怕雪山巍峨,哪怕草地茫茫——终有走到的一天。

九十年前他们出发时,并不知道自己能走到哪里。但他们相信,只要往前走,就一定能看到希望。他们把希望带到了这里。而我所要做的,就是继续往前走。

因为长征,从来没有终点。

文艺周刊

第三〇九八期
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专版